

河北美术出版社

郑闻慧 / 著

AUTHOR: ZHENG WENHUI

回忆我的丈夫黄胄

炎黄
痴子

IN REMEMBRANCE OF
MY HUSBAND HUANGZHOU



回忆我的丈夫黄胄 | 炎黄
痴子 |
IN REMEMBRANCE OF
MY HUSBAND HUANGZHOU

郑闻慧 / 著
AUTHOR: ZHENG WENHUI
河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忆我的丈夫黄胄 / 郑闻慧著. — 石家庄: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5310-3052-2

I. 回 II. 郑 III. 黄胄 (1925~1997) — 回忆录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91776号

出版发行

河北美术出版社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邮编 050071)

出品

北京梓耘书舫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2号8号楼905, 邮编 100101)

责任编辑

王素芝

特约编辑

康丽 牟琳琳

装帧设计

北京梓耘书舫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印制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出版日期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10-3052-2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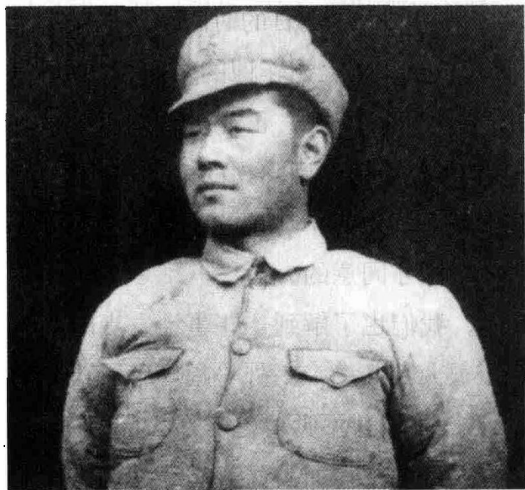
目 录

1	第一章 美好岁月
29	第二章 风华正茂
79	第三章 经历磨难
139	第四章 鞠躬尽瘁
163	第五章 冰山之行
199	第六章 江山如画
217	第七章 进退两难
271	第八章 友好使者
289	第九章 创业艰难
319	第十章 生命之光

第一章 美好岁月

1949年我离开家乡，到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工作、学习。先是在幼儿园任教，后考上幼儿教育系，成为一名大学生。1950年，我由幼儿教育系转到艺术系，我的目的是想学音乐。可是音乐系当时还没有成立，只有美术系。我到了美术系以后，听别人讲美术系的师资在学校里是比较强的，我们的老师吕斯百是从法国回来的，他是徐悲鸿先生的学生，很有成就。解放后曾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毕业时他要求到边疆，分配到我们学校。他对我们说，我曾经向在北京的徐悲鸿先生要美术教员，可徐先生说：“为什么向我要教员呢？在你们西北就有一个画得很好的青年画家，叫做黄画胄。”他听了徐先生的话，就开始在西北寻找“黄画胄”，可是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于是又问徐悲鸿先生，徐先生说好像是在军队。吕斯百先生又去军队中寻找，终于找到了，原来不叫什么“黄画胄”，而是叫梁黄胄。

吕斯百老师以前曾是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系主任。徐悲鸿先生是宜兴人，吕斯百是无锡人，吕斯百在当小学教员时，徐先生已经成名了。有一次吕斯百把自己的作品拿给徐先生看，徐先生很欣赏，利用庚子赔款的钱可以派大学生留洋的机会介绍吕斯百去了法国，在法国美术学院学习，回国后到了徐先生所在的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做油画教员。吕先生与他的恩师徐悲鸿先生的关系特别好。当时徐先生与夫人蒋碧薇的矛盾越来越深。蒋碧薇与主管教育的国民党官员张道藩交往密切，关系暧昧，所以常有一些特务给徐先生捣乱。徐先生性情刚直，受不了这个气，便委托吕斯百做美术系的系主任。在旧社会一个搞美术的人要想混下去是很不容易的。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排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吕先生表现得很积极，他的恩师徐悲鸿先生也劝他要心胸开阔，好好画画、教书。吕先生在赴西北我们学院任艺术系主任之前，又去拜



望了徐悲鸿，徐先生特意向他推荐了黄胄。

吕先生经过许多周折终于在西北军区找到了黄胄。当时黄胄在第一野战军战士读物社任美术记者兼编辑，每个月都要出一本很厚的普及读物，绘画占很大比例。黄胄要在《战士读物》上画漫画、连环画，还要介绍军队中的好人好事。他的任务很繁重，部队不愿意放他。吕先生再三要求院

长去交涉，他自己也到杂志社去，看望和动员黄胄。最后部队要求我们学校体育系为军区培养篮球运动员作为交换条件，答应黄胄在不影响出杂志的情况下为我们代课。

那时的战士读物社不是在西北军区的总部，而是在七里河。七里河和我们学校所在的十里店本来是遥遥相望的，只是隔了一道黄河。如果是现在很快就到了，而那时黄河上只有一座铁桥，是在兰州大学的旁边，所以黄胄要到我们学校教课得绕道先到兰州市，然后再乘马车到我们学校（那时到十里店还没有公共汽车），所以教那么几堂课也是很费事的。

吕先生对我们说：“不久将有一位年轻的老师来教你们，这个老师画的画儿非常好，是自学成才的，非常用功，他的作品在全国得了奖。”我们学生听后就一直盼望着这个老师赶快来，我们很想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模样儿。可是总也不见他来，听说他不常在兰州，经常深入基层连队。

到了1950年，我们开学大约有一个月的样子，吕先生领了一个中等个子、脸膛黑红色的青年来到了我们教室。这个人的腿有些瘸，我们正在奇怪的时候，吕先生说道：“大家注意了，这位就是梁黄胄先生，他将给你们教创作课。由于他随军队去青海剿匪，右腿受了伤，又得了严重的关节炎，所以在上课时你们一定要搬一把椅子给他坐。梁先生在军队的工作任务很重，

解放初来我们学校任教的黄胄。

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没有时间来给你们上课，只能利用星期日的时间，所以星期天你们就不能够玩了，因为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都是上创作课的时间。”听了吕先生的话，我们的心里都有些别扭，那时我还不到19岁，正是贪玩的年龄，好好的星期天却不能休息玩耍，要听这样一位其貌不扬一瘸一拐的“老师”讲课，真是没意思。后来我们才知道能请到这样一位老师是挺不容易的，是在我们学校答应了西北军区的一个条件的前提下，西北军区才同意的。

吕斯百老师给我们介绍了黄胄的情况后，我们也了解到一些事情。当时黄胄的一幅作品《爹去打老蒋》在美术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另外一幅《苹果花开的时候》也受到很多人的赞扬，还得了奖。但是我们并不觉得他有多么的了不起，当时他只有二十四五岁，比班里有的同学才大一两岁，而且又一瘸一拐的。我们心里难免怀疑这样一个年轻人，又不是老先生，究竟能不能教得好我们。

在上创作课的时候，班长给黄胄搬了一把椅子放到台上，但黄胄却往往不能坐着讲课，因为我们的黑板很高，他要在黑板上写字、画画儿的时候，必须得站起来才够得着。第一次上创作课的时候，黄胄对我们说：“你们的创作课我也不知该怎样教，但总的来说应该要发挥自己的才智，也必须锻炼自己的技巧。”他告诉我们：“技巧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没有技巧，你可能会想要画一个人笑，却画成了一个人哭。因此创作必须依赖于技巧，你们要多多练习绘画的技巧。你们的吕先生素描画得非常好，他在法国受过严格的训练。而我却在素描方面没有得到过正规的指导，只是在画的时候敢于去画就是了。”

黄胄给我们来上一次课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兰州风沙非常大，遇到刮风就更难了。他每次来都要花费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假如不顺利，就要花费近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学校为此在十里店的教职员宿舍给了他一间房子，让他在星期六就到学校来往。可是有时候他要赶着为战士读物社发稿，星期六到不了学校，往往在星期天早上九点半、十点才来。因此我们的创作课也上得挺自由的。

兰州的冬天是很冷的，我们学校的教室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炉子，炉子的火都是学生们自己生，经常是过几个小时就灭了。我们的宿舍里更冷，冷到只要将湿毛巾搭在屋子里便会立即结冰的程度。因此那时的条件可以说是非常艰苦的。

黄胄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总是穿着一条大棉裤、一件羊皮大衣。有时他去



《爹去打老蒋》
第一次全国美展
作品。此作品引起
了徐悲鸿先生的注
意，现藏于徐悲鸿
纪念馆。

了新疆或青海就不来上课了，我们希望他不来，那样的话，星期天就可以洗衣服、打羽毛球，或者去滑冰。不过有的时候又很想念他，因为他的到来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乐趣。比如他会以很快的速度给我们画一个丘吉尔，一个铁托，一个艾森豪威尔或

是其他的外国人物。因为那时画漫画儿是很受欢迎的，我们觉得他画得那么神奇，那么迅速，而这却是吕斯百等老师所不能及的。

那时，我们的老师还有一个叫刘文清的，也是从法国回来的，教我们素描课。还有一个教速写的韩天眷老师和教理论的洪毅然老师。我们对这些老师都有几分议论，而对梁黄胄先生却越来越佩服了，因为他和别的老师相比画得又快又好，而且给学生改稿子一下子就改好了，一点儿也不费劲儿。所以同学们经常学他走路，学他把舌头放在嘴边专心画速写的样子，并经常说起自己的理想是做吕斯百或者是黄胄，甚至说达到他们的水平这一辈子也算不白活了。

我们真正开始上创作课是在1950年的冬天，那时候他教我们画年画。当时班里有12个同学，被分成了四个组，一组是3个人，我们两个女同学功课都不太好，因此被分别分在较强的组里进行创作。我们那个组创作的是人们欢迎从抗美援朝战场胜利归来的坦克勇士的画面，这个情景说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画的，因为场面大、人物多。我们有两个星期一直在不停地找资料翻画报，忙上忙下地画，甚至连星期日也没有休息。而我们的素描和速写的水平都不高，造型能力也差，虽然很努力，找了不少画报，却画得不好。黄胄于是手把手地教我们

每个人，他画得快，改得也快，只用了五六分钟便将我们画的改好了。他改的时候，不用橡皮，而是在画面上直接用毛笔修改。我们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他改得太快了，他的手上好像有魔法似的，“唰唰唰”几笔，一个人物就活灵活现地出来了，我们十几天的心血，他几分钟就全给改掉了，让人有点难以接受。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的造型能力很强，给我们改得像一张画了。

在这以后我们的年画创作开始转向细节部分的描绘，如上颜色、描线等。黄胄觉得我的造型能力很差，但勾线的能力相对来说要强一些，便对我说：“你的线条尽管看起来勾得还比较有力，但你的造型这么差，怎么能够用艺术语言来表达你的感受呢？绘画是造型艺术，技巧是很重要的。不讲造型技巧，光能勾线也是没多大用的。”这给我震动很大。另外他告诉我们年画是劳动人民所喜爱的艺术形式，一定要多注意观察民间喜闻乐见的事物，颜色该鲜明的一定鲜明，该强烈的一定强烈。

不久，我们的作业完成了，便在教室挂了出来，吕斯百、刘文清等老师都来观看。他们虽然也表扬了我们，但同时也对我们说：“你们画的画儿，看起来都是经过梁黄胄先生改过的。他改过了，你们才有这样的成绩，这不能真正算是你们的成绩。”我们听了这些话，心里不免有些扫兴。

年画课上完后，黄胄开始对我们讲：“你们应该自己像背文章一样背着画一些画，画自己所见过的，甚至以画作日记，不要光画头像，你们的速写老师总让你们画头像是不对的，对于创作来说不是好办法。”他直率地批评了刘文清老师的画法，“四个小时的素描课找不到一条正确的线，把时间都浪费在游



美术系主任吕斯百先生（左第一人）和同学靳鑑、李淑琪、郑闻慧、刘枫。

离不定地寻找面的分解上，不是好方法。”刘文清老师是昆明人，人长得不怎么漂亮，个子又矮，但挺斯文，因为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还带着一些洋味儿。听说原来他家里很有钱，他在法国的时候爱上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曾经接受过他的资助，可后来却因嫌弃他的外表而离开了他。因此刘老师一直显得沉默寡言，也不大与我们班同学在一起玩儿。

在所有教我们画的老师里，我们觉得最亲近最让人佩服的就是梁黄胄老师了，我们与他的感情最深，而刘文清老师对此很有些不满意。他认为梁黄胄没有上过什么正规的大学，也不讲素描，实在不值得学生对他这样的尊敬和爱戴，因此每每在言语间对黄胄夹带着讥讽味。而黄胄也不示弱，也经常故意地问刘老师有什么好作品问世啊等等，所以在我们这12个学生中往往也展开了这一类问题的争论。

元旦前，我们的作业都完成了，准备在进行观摩展览的同时开一次联欢会。这在我们系是一件大事，我们邀请梁黄胄老师住在学校，与我们一起过新年。这次刘文清老师也表现得很热情，像是又回到了法国似的。在他指导下，把教室布置得非常漂亮，如同过圣诞节一般。美术系里一共有三个年级，三年级只有3个学生，我们二年级有12个，而一年级有三十多个，全系四十多人在一起聚会。会上同学们表演各自拿手的节目，还请几位老师表演。先是请刘文清老师出场，刘老师唱了一支法国歌曲，我们也听不懂，就随便拍了几下。轮到黄胄时，他先是给我们唱了一段河南梆子，我们觉得他唱得特别有味道，就跳起来给他鼓掌，并欢迎他再来一个。于是他又唱了一段河南坠子，接着又唱了一段山西梆子。整个晚会虽然穿插了同学们的一些表演，但以黄胄的节目最多最棒，他几乎成了晚会的中心人物。我们每一个人都沉浸在幸福之中，激动不已，互相谈论、赞扬黄胄。同学们说这个人真不简单，不仅有绘画的天才，而且还有演唱的天才。经过这次晚会，我心里更加佩服他了，并且开始暗暗注意起他的言语和行动，星期天也暗自盼望他早一点儿来学校。

这以后有一段时间他没来给我们上课，因为他到青海下连队体验生活去了。虽然有些想念他，但也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利用上课的时间去滑冰了。学校里有一个简陋的冰场，也有一些冰鞋。有一个星期天我们正在兴高采烈地滑冰的时候，忽然听到黄胄那洪亮的声音：“喂！你们怎么都在这儿滑冰，不上课了？”真吓了我们一大跳。同学们急急忙忙往岸上跑，我不小心“哐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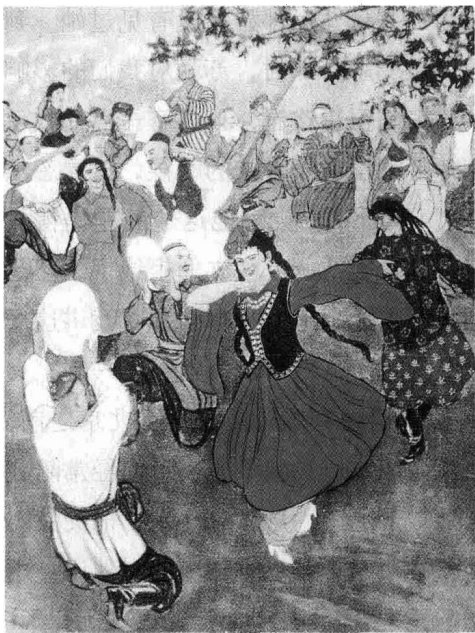
摔倒在冰场上，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这时黄胄忙说：“不要紧，不要紧，这节课干脆就在滑冰场上得了。我的腿瘸了滑不了，你们可以滑冰，也可以练习速写，捕捉滑冰同学的姿态，然后把这些速写背下来。”我们于是定下神来，有的脱了冰鞋跑到黄胄身边看他如何为滑冰的同学画速写，有的继续在冰场上给黄胄做模特儿。钟表的秒针“滴答滴答”地往前走，黄胄飞快地用笔去画那些滑冰同学的优美姿态，画了一个又一个，同学们都觉得那堂课上得非常生动。当大家说说笑笑地往回走的时候，就像没上过课还在玩一样，而实际上却很有收获地度过了星期天这四个小时的创作课，我们开始认识到创作与速写是密不可分的。

过了一个星期，黄胄把几张滑冰的速写拿来给我们看，这使我们非常惊奇。因为滑冰的姿态变化是相当快的，他能以最简练的线条画出来是很不容易的。不过我们听说他早晨起来后，经常到黄河边去画那些驮水毛驴、骡子以及那些洗衣服的人们。难怪他的速写能够那么简练而且准确。

我们最喜欢的季节莫过于兰州的夏天了。我们所住的十里店正好在黄河边上，那时黄河边有许多水车，不断地把水提取上来浇灌那些西瓜地和菜地。到了夏天收瓜的时节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可以跑到瓜地，用最便宜的价钱买西瓜吃。我们这些学生上了二年级后都开始有了助学金，因为是师范生，每月还有三块钱的卫生费，用来买手纸、肥皂什么的。而我们常常把这笔钱留下来买零食。黄胄好像对我们这个班的同学特别好，有时上课，他便自己掏钱买一个大西瓜请大家一起吃。兰州的西瓜很大也很甜，十一二个人吃一个大西瓜足以使大家快乐不已了。

到了暑假的时候，除了到兰州的黄河边去画水车，我们也没有多少可以去的地方。当时刘文清老师教我们水彩画，他要求我们常去外面写生，我们也很喜欢画兰州的黄色土地和湛蓝的天空。于是我们就背着画夹子去写生，尤其是我和好友李淑琪两个女孩子背起画夹子走在路上显得十分神气，常常会招来体育系同学羡慕的目光，他们从上到下打量我们，这使我们又高兴又害怕。

有时候我们也成群结伙地去城里，那时黄胄已从七里店搬到西北军区的总部。西北军区的总部是在雁滩的对面，我们坐羊皮筏子可以直接到他们后门，然后找到黄胄的宿舍里去。我们这群人，总有五六个常到黄胄那儿去玩。黄胄的画室实在是乱得出奇，茶缸子、臭袜子乱扔乱放，他自己也是不修边幅。因为晚上他



经常要赶画连环画、插图和漫画，我们去的时候，他经常是刚刚起床。在西北军区的旁边有一个专做烤包子的小店儿，我们每次去，黄胄总是请我们在小店儿里吃一顿烤包子，我们大家快快活活地吃烤包子，说说笑笑玩上半天，然后再坐马车返回学校。

到了三年级第二学期和四年级第一学期，我对黄胄的印象越来越好，总爱在他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干。我很喜爱唱歌，本来是可以转到音乐系的，因为音乐系的声乐教员对我的音色很感兴趣，希望我去给他们领唱，同时我也觉得自

己的美术天分不够，却有几分音乐天才。音乐系的声乐教员很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出色的歌唱家，他一边让我练声，一边让我抽出时间学弹钢琴，而我爱唱歌却不爱弹钢琴。因为我是外系学生，声乐老师教我练声时间只能排在星期天，于是上天赐给我一个很好的表现自己的机会。黄胄在给我们上课之前，刚好能听到我练声时洪亮的声音。我内心期盼着自己洪亮的嗓音能够打动他，不过最终我也不清楚自己的目的达到了没有。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对黄胄已经有了很强烈的好感，并且产生了爱慕。

虽说我非常认真地练习声乐，音乐系的老师也多次劝我转系，他们说：“你的嗓子音色、音质都很好，你转到我们系来，从二年级开始读，从头学起，你的音乐造诣可能会比美术造诣高得多。”我也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尽管我的声音、气质被音乐系的老师和同学们赞扬和肯定，可还是不能真正引起我对音乐强烈的追求之心，而仅仅满足于业余爱好而已。这也许是因为我心里牵挂着当时我的老师梁黄胄吧。

在这段时间里，我听说黄胄已经有了一个女朋友，是一个

《苹果花开的时候》，黄胄作于1950年，全国美展一等奖。

女工程师，搞纺织的。不过尽管我们常去黄胄那儿玩儿，却始终没有见过她。到四年级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参观实习了，地点是北京。那时，苏联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当时有一本叫做《星火》的杂志，大家都很喜欢看，只要有一点儿钱就去买来看。记得我们将起程去北京参观北京师范大学教学方法的时候，黄胄忽然对我说：“你需要不需要钱去买一些参考书？”我听了，觉得他这个问题提得太唐突了，作为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轻易接受老师的钱呢？所以我立即拒绝了。但是尽管如此，我却连着几个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想：他为什么会对我讲这样的话？他究竟是什么用意呢？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只好随班里同学一起上火车去了北京，不过我暗自感觉到自己在他的心里已经有些分量了。去北京之前，我曾经在西安认识一个人民大学的助教，姓郝。他知道我到了北京，便经常陪我到天安门、西四、东四等处去逛，还带我去乘有轨电车。然而有一次，他突然对我说他爱我，我听见这句话一下子便对他起了反感，觉得他真无聊，便对他说：“本来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兄长，现在才知道你用心良苦，我希望你不要再打扰我了，我也该回兰州去了，以后我们不要再来往了。”这样，我就回到了兰州，这个人在我脑子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回到兰州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黄胄，因为他又去了青海。面临着毕业分配，我心里很烦乱，不知应该去向何方。我们在志愿书上都写的是服从分配，不过院方还是会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照顾我们的，如果有了朋友或家庭的，组织上在分配时都会给予考虑，但都是在西北地区。在这期间，班里有一个同学，曾与我在一个创作小组切磋技艺，画画的水平比我强得多，造型能力也不错，他向我提出能否和我进一步发展友谊。我认真而且坚决地回答说：“不行，我不想这么早谈恋爱。”他说：“我知道你心里已经有人了。”我忙说：“不是的，我心里没有人，只是现在不想谈恋爱。”他指指他的胳膊肘，说：“你爱的就是他。”我说：“也许是吧，你也就死了心吧。咱们好好地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得了。”

后来我们就各自奔赴自己的岗位。我被分到了西安女子中学任教。我们这个年级（包括别的系）有六个同学被分到西安，除我以外还有萧冰水、李淑琪和她的男朋友，还有一个我忘记他的名字了。我们几个人经常来往，但也没有同谁保持特殊的关系，我自己也看不上其中的两个男同学，觉得他们太秀气，没有男子汉的气质。只不过因为我们都没有家，所以常常聚在一起谈谈艺术、聊聊工作上的一些事情。而我的心里却是孤独不安的，因为他们之中没有我爱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黄胄的一封信。黄胄的这封信写得很明确和自信，在信里说他很爱我，早就想向我表示他的爱情，可是没有机会。他说他三年来一直在注意我，觉得我朴素、大方、勤俭，正是他所需要的终身伴侣，非常想用

他的双臂来拥抱我，给我一个可以依赖、休息的臂膀，给我一切我想得到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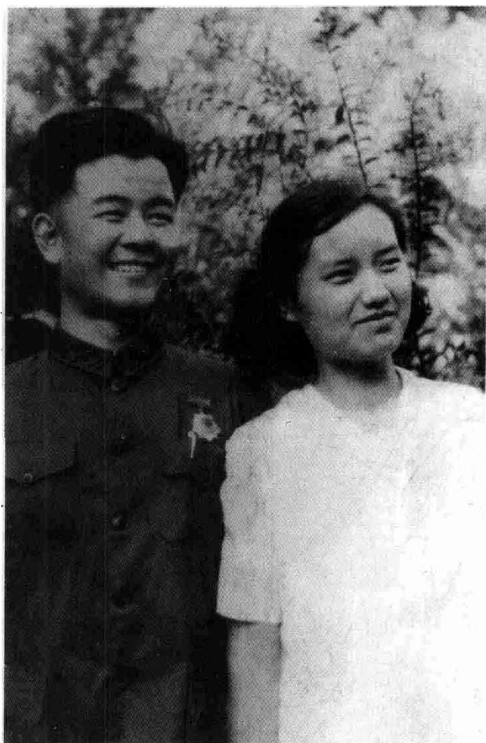
他信中所说的这一切，正是我许久以来盼望得到的，我在看信的这一瞬间兴奋极了，几乎激动得想跳起来。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双腿却变得软绵绵的，不但没有跳起来，而且觉得站立不住，似乎要晕倒的样子。我这才发觉，爱情原来是这样地让人神魂颠倒。我很快地给他写了回信，告诉他：他的信很打动我，让我觉得很幸福、很安慰，我也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在等待着他向我求爱，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希望暑假的时候我们能够见面。

可是暑假还没有到，有一天他却突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的出现使我几乎晕了过去。当时我住在女生宿舍的一个小套间里，传达室的同志跑来告诉我，外面有个人自称是你的男朋友，想要进来看你。我出去一看，见是黄胄，便手忙脚乱地将他领进我的宿舍。进了宿舍，我们来不及说话，便拥抱在一起了。他一边紧紧地抱着我，一边低声说道：“我来了，我将永远与你结合在一起。”说完，便开始热烈地吻我，吻了好久好久。

由于害怕楼下的学生们听到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我便与黄胄离开学校，到市里的联合公园去。联合公园很美，我们找到一处幽静的地方，然后肩并肩地坐在一起，聊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未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妙。

黄胄到我的身边，每天我们都到处游荡，离开时就难舍难分。

联合公园本来叫做莲湖公园。公园里有一片美丽的湖泊，此时正是夏天，湖面上盛开着许多莲花，湖周围还有一丛丛的芦苇和垂杨柳，因此要找到一处没有人的僻静地方是很容易的。那时我们虽不像现代人那么开放，但仍然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手拉着手，甚至亲吻、爱抚。可是有时我忽然感到有些害怕，怯生生地对黄胄说：“我有点儿怕你。”他说：“你为什么会有怕我的感觉呢？”我说：“以前我一直叫你梁先生，现在改口都改不过来。”他说：“我知道这不是主要原因，最主要的是你怕生孩子，对不对？”我说：“是，我很害怕生孩子。”他说：“那我们尽量不要孩子，好吗？”我说：“好。”他接着说：“我的假期有限，我们就定在8月4日举行结婚仪式好吗？”“好。但是你母亲不在西安，我父亲又不能来，谁给咱们做主婚人啊？”我高兴而又犹豫地问他。“我的老师赵望云啊。”“噢！我知道了，就是那位有很多作品发表在《大公报》上的著名农村写生画家吧？现在已经是文化局的局长了，他肯吗？”“肯！他是我的恩师，我从18岁就在他身边，亏得有他接待我，我才能过上比较安定一点的生活。他不光教我画画，也给我树立了用图画反映生活的榜样。他很爱我，听见我要结婚了，他一定会高兴，明天咱们就到老师家去，让老师和师母看看你，问他们中意不中意。”他接着我说。我索性靠在他胸前，反问：“如果他们不中意呢？”“不会的。赵老师性格豁达，他和我有相同的命运。他也是15岁上失去父亲，从此没有机会上学，去当制皮学徒。因为他热爱美术，毅然离开家乡束鹿，漂泊到北京。后来接触‘五四’新文化艺术的思潮——走出象牙塔，来到十字街头，



1954年8月4日，
黄胄和我结婚了。